

# 同盟瓦解：鄧小平時代的中朝關係，1977-1992（上）

• 沈志華

**摘要：**中國改革開放的年代是中朝關係發生根本轉變的時期。毛澤東時代，中朝同盟具有廣泛而深厚的基礎，涉及領袖個人因素、外交戰略、意識形態、經濟關係、地緣政治等諸多因素。本文主要討論鄧小平時代，特別是1980年代中期以後，隨着中國在改革開放道路上的迅猛前進，中朝之間的利益關係逐步斷裂，其同盟的基礎在各個方面都相繼瓦解，而1992年中韓建交則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關鍵詞：**朝鮮半島 中朝同盟 中美關係 中韓關係 改革開放

編者按：由於篇幅關係，本刊將分兩期刊出沈志華教授的文章，本期先刊出第一至三節。

本文要討論的是鄧小平時代即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中朝關係以及中國對朝鮮政策變化的歷史。以往關於這方面的研究論文和專著着實不少，但多是作為「現實問題」在國際政治學的範疇內進行論述的，所使用的材料也大都是當時公開的資料<sup>①</sup>。筆者試圖從歷史學的角度，利用已有的各國檔案文獻、重要年譜和口述史料，對中朝同盟破裂的過程進行一番梳理。不過，由於這一時期中國的檔案基本沒有開放，美國、韓國和日本的檔案也只解密到1980年代中期，故尚缺乏完整、系統的證據鏈。對於這段歷史，特別是中韓建交的過程，筆者只能根據目前可以掌握的史料，述其概要。

\* 本文收入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增訂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一書，經作者和出版社同意授權轉載。

從1950年10月中國出兵朝鮮開始，中朝之間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同盟關係，儘管到1961年7月才正式簽訂《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與短暫的中蘇同盟以及中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相比，中朝同盟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相對長期地存在，直到冷戰結束。中蘇同盟只存在了十幾年的時間，隨着中蘇分裂，中國與東歐多數國家以及蒙古的友好關係也走到了盡頭，即便是僅存的盟友阿爾巴尼亞和越南，到1970年代也與中國分道揚鑣<sup>②</sup>。只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儘管與中國的關係起伏不定、冷暖無常，但畢竟保持了四十多年的同盟關係。

由毛澤東和金日成建立起來的中朝同盟，具有廣泛而深厚的基礎，這反映在領袖個人因素、外交戰略、意識形態、經濟關係、地緣政治等諸多方面。1970年代中美關係實現緩和並逐步正常化以後，美國不再是中國的頭號敵人，甚至成為中國對抗蘇聯的潛在盟友，中朝之間的特殊關係和同盟基礎第一次開始發生動搖；但構成同盟基礎的要素依然存在，甚至有些還得到了加強，毛澤東對朝認知和政策的基本理念也沒有發生變化。而只要這個基礎存在，不管中朝之間出現怎樣的矛盾和分歧，一旦這種矛盾和分歧威脅到同盟的生存，利益的一致性就會驅使雙方調整各自的政策，竭力彌合裂痕，以維持同盟關係<sup>③</sup>。

在毛澤東以後的時代，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以鄧小平為主的中共領導人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戰略方針，帶領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開始了新的里程<sup>④</sup>。經濟體制和外交戰略的變化，給中國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生機和空間。如果說1950年代蘇聯的援助是現代科學技術（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向新中國的第一次大轉移，並由此把中國帶入了現代化的進程，那麼1980年代開始的改革開放則實現了更先進的科學技術（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向中國的第二次大轉移，並由此奠定了中國復興和邁進世界強國行列的基礎。這個巨大變化，不可能不對中朝關係產生深刻影響。

改革開放的年代，也是中朝關係發生根本轉變的時期。在鄧小平執掌政權的這十幾年裏，中朝關係表面上友好互助，親密如常，兩國領導人依然頻繁互訪，大眾媒體的贊歌頌詞仍舊不絕於耳。然而，就是在這看似祥和的歌舞昇平中，隨着中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特別是外交方針的重大調整，維繫中朝關係的共同利益漸漸消失，維持中朝同盟關係的各項基礎已經全面動搖並逐步瓦解。概括起來說，這個瓦解的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7-1982）：改革開放之初。對內，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探索並逐步確定了改革開放的路線；對外，鄧小平把中美關係正常化定位為戰略問題，積極推動中美建交。這在客觀上動搖了中朝同盟的基礎，也注定了這一同盟的命運。不過，此時蘇聯仍然是對中國安全的最大威脅，朝鮮在地緣政治方面對中國仍具有特殊意義，加上對朝友好傳統政策的慣性作用，中朝關係繼續保持親密無間的狀態。

第二階段（1983-1988）：中國走上全面改革開放的道路。對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形成，政治體制改革循序漸進；對外，堅決貫徹從國家根本利益出發（而不是以意識形態劃線）的獨立自主外交方針。隨着中蘇關係開

始解凍，中國逐步調整對美、對蘇政策，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強化與第二世界國家的聯繫。在這種大環境下，中朝之間的分歧不斷擴大，中國首先開始調整對朝鮮的經濟政策。與此同時，中韓關係在民間貿易、文化體育交流等方面迅速開展。中朝同盟的裂痕漸漸顯露。

第三階段(1989-1992)：中國發生政治風波和蘇聯解體。對內，鄧小平力挽狂瀾，堅持繼續走改革開放的道路；對外，中國堅決頂住美國和西方的壓力，積極尋找外交突破口，爭取和平發展的良好國際環境。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不顧朝鮮的反對和不滿，全面調整對韓國的政策，並在推動朝美會談、促進朝鮮半島局勢穩定的基礎上，從允許中韓兩國互設貿易代表處，到支持韓國關於南北雙方同時加入聯合國的建議，一步步掃除了中韓建交的政治障礙。中韓建交在邏輯上就意味着中朝同盟的破裂。

總之，到冷戰結束、中韓建交，中朝同盟關係終於成為歷史上被翻過去的一頁。

## 一 故人去世：領袖個人因素不復存在

1976年1月和9月，周恩來和毛澤東相繼去世，金日成失去了兩位知己，維繫中朝同盟基礎的領袖個人因素也從此消失。據說，周恩來去世時金日成哭紅了眼，以致耽誤了眼疾手術。後來，金日成在朝鮮為周恩來建立了唯一一座外國人的銅像<sup>⑤</sup>。毛澤東自稱與金日成是多年的老朋友<sup>⑥</sup>，此話不虛。歷史上中朝關係中的兩次高潮，皆因毛主席和周總理對金首相給予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饋贈：1958年駐朝中國人民志願軍全部撤退回國；1962年將天池大部和長白山主峰讓予朝鮮。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多次稱中國東北就是朝鮮的「大後方」，將來要交給金日成「打理」；金日成則主動邀請東北局和東北三省領導幹部到朝鮮休養，還親自到東北三省「視察」，聽取司局級幹部匯報工作<sup>⑦</sup>。這種情況，恐怕只有在毛澤東的「天朝」理念指導下，只有在毛時代的中朝特殊關係中才會發生。鄧小平是決計不會做出這種事情的。

早在1977年春，尚未出山的鄧小平就對「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提法有不同看法<sup>⑧</sup>。再次復出主持工作後，鄧小平繼續推動「思想解放」，打破多年來盛行的個人崇拜禁錮<sup>⑨</sup>。1980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sup>⑩</sup>，意在進一步消除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個人光環。而當時朝鮮勞動黨的宣傳則進一步強調領袖的作用，說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是領袖的事業」，「是由領袖開闢和完成的」；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命運「取決於領袖的作用」，離開了領袖的正確領導，「就談不上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發生、發展和勝利」<sup>⑪</sup>。正如美國國務院一份簡報所評述：「毫無疑問，金日成對中國打破毛的神話不會感到欣喜，而是將其看作對正統共產主義信條和他自身個人崇拜的挑戰，與之前他看待莫斯科去斯大林化一樣。」<sup>⑫</sup>

1978年5月華國鋒訪朝，場面宏偉而熱烈，報章評論為中朝「友誼的新高峰」<sup>⑬</sup>。然而，當時很少有人知道隨行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耿飴在內部

傳達的一個情況：中國領導人並不同意朝鮮關於「主體」(Chuch'e/Juche)思想的提法和金日成準備將政權傳給兒子的做法，因而在會談中有意迴避了這些話題<sup>⑭</sup>。另一方面，金日成曾追隨毛澤東，有意無意地捲入了中國黨內的政治鬥爭——如1959年對彭德懷的批判<sup>⑮</sup>，1976年對鄧小平的批判<sup>⑯</sup>，現在這些幹部都翻過身來，多少會使金日成感到有些尷尬<sup>⑰</sup>。

儘管出於對抗蘇聯的考慮，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繼承了毛澤東對朝鮮的友好立場和友善態度，後來也接受了金日成指定的接班人——他的兒子金正日<sup>⑱</sup>，但是他們無論如何再也不會像毛澤東那樣處理與朝鮮的關係了。例如，1989年政治風波後，金日成趁中國陷於國際孤立之際，反覆向新上任的中國領導人江澤民提出東北是朝鮮的大後方的話題，朝鮮從中央到地方的幹部也不斷表達同樣意思，但中方就是不接話茬，也不予考慮。對於朝鮮把金正日與金日成並列，要喊祝他們「萬壽無疆」的做法，中國也不能接受<sup>⑲</sup>。如果說在金日成和鄧小平這些老一代革命家之間還保留了一些舊情，那麼在兩國新一代領導人之間則完全缺乏個人交情和歷史淵源的基礎。筆者曾當面問過江澤民對金正日的印象，這位已退休的總書記沉思了一會兒，不以為然地說：「小金這個人很狡猾。」<sup>⑳</sup>中國有關部門和地方幹部對於金正日在訪華期間講究排場、隨心所欲的做法更是不屑一顧<sup>㉑</sup>。

## 二 對外政策分歧：外交戰略基礎全面破裂

在鄧小平時代，中朝之間對外政策的分歧同樣反映在對美國、蘇聯的方針和對待世界革命的態度兩個方面，但是與毛澤東時代的不同之處在於，鄧小平推動中美建交、改善與美國的關係絕非僅是策略考慮，而是出於戰略的需要；鄧小平放棄世界革命的方針也有着戰略方面的考量，而非出於迫不得已。鄧小平接掌政權以後，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就是要把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為此，在國內就要進行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改革，在國際上就要有一個相對長期的和平、寬鬆的環境。於是，中國領導人對於時代的看法就發生了根本改變：以前說是「革命與戰爭」的時代，現在說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sup>㉒</sup>。在這種情況下，對外政策和方針自然也會發生根本的改變。

1977年9月至1978年7月，鄧小平致力於推動中美關係的發展，並多次對美國人講：中美關係「不是外交問題，是政治問題。我們是從戰略角度來看問題的」；「歸根到底，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問題，要從政治角度來考慮，要從長遠的戰略觀點來解決」<sup>㉓</sup>。中美正式建交後，鄧小平於1979年1月訪美，並發表講話稱：中美兩國友好合作，「必將對世界形勢的發展產生積極的深遠的影響」<sup>㉔</sup>。隨後幾年，中美關係基本上保持了穩定發展的勢頭。兩國政治磋商有所加強，經貿、科技、文教等方面的合作不斷擴大。1986年中美貿易額達73.36億美元，1987年美國累計對華投資協議金額達31億美元，居各國在華投資之首<sup>㉕</sup>。1989年2月美國總統布什(George H. W. Bush)訪華時說：美國對中美關係的發展感到欣慰，希望繼續「栽樹」，以便後人「乘涼」。中國國家主

席楊尚昆則指出：中美兩國友好合作「對推動世界局勢的發展，維護世界和平、安全與穩定有着重大意義」<sup>②6</sup>。

然而，朝鮮對美國的立場依舊未變，朝鮮的革命鬥爭仍然是「同帝國主義的頭子——美帝國主義者直接對峙」<sup>②7</sup>。在1980年10月朝鮮勞動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金日成告誡：「對帝國主義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是決不會改變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應當同帝國主義進行無原則的妥協」；「不應該拿原則問題來同帝國主義者討價還價，不能把革命的根本利益出賣給帝國主義者」，「也不應該採取為本國的利益而犧牲別國利益的行動」<sup>②8</sup>。這些話自然不只是講給黨內同志聽的。金正日在1983年5月更提出：為「取得世界革命的勝利，就必須加強反帝反美鬥爭」；「由於美帝在世界各地進行挑起新戰爭的陰謀活動，今天人類面前提出來的是世界戰爭還是和平這樣一個深刻的問題」<sup>②9</sup>。

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領導人仍然把蘇聯視為最主要的安全威脅，國際鬥爭和「反霸」的矛頭也還是指向莫斯科。1979年4月初，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一致通過了不延長將於1980年4月11日期滿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決議<sup>③0</sup>。在7月7日召開的第五次駐外使節會議上，鄧小平發表講話說：「新的世界戰爭要來的話，只能來自蘇聯，對中國唯一威脅來自蘇聯。所謂反霸，就是側重反對一霸，聯合兩霸中間的一霸。」他還說，中國現在需要的資金和技術，主要來自美國、日本和西歐，因此「對蘇聯的關係鬆不得」<sup>③1</sup>。1980年代中期，中國與東歐國家的關係開始鬆動，但中央外事領導小組認為，與蘇共恢復正常關係還根本談不上。1980年代後期，中蘇關係雖已有所改善，但中共中央內部還是明確規定，「中蘇關係不能超過中美關係」<sup>③2</sup>。

至於蘇朝關係，從1970年代以來一直疙疙瘩瘩，朝鮮無疑需要蘇聯的武器裝備和經濟援助，但對蘇聯人算起賬來斤斤計較的做法很是反感<sup>③3</sup>；蘇聯也需要把朝鮮作為在東亞地區制約中國和美國的棋子，但時時處處要提防被平壤「綁架」<sup>③4</sup>。由於中美關係改善，特別是美國對東北亞的軍事壓力增大，朝鮮和蘇聯之間的關係便開始拉近。1984年3月31日，金日成接見蘇聯塔斯社(TACC)代表團時，對蘇聯報刊揭露和譴責美國及美日韓同盟的文章給予高度評價，並說「我們將同你們一起，高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旗幟，繼續堅定地站在反帝的共同戰線上」<sup>③5</sup>。5月16日至7月1日，金日成在蘇聯和東歐國家進行了四十七天的出訪，這是他二十三年以來第一次正式訪問蘇聯。為此，《勞動新聞》發表社論，稱「朝鮮和蘇聯是在實現共同的目標和理想的鬥爭中，以階級紐帶聯結起來的同盟者」。這次出訪中金日成所到之處，朝鮮報章都發表了類似的社論<sup>③6</sup>。

金日成回國後，朝鮮勞動黨召開了中央全會並發表公報，稱這次訪問「有力地顯示了社會主義國家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統一與團結」；「是把傳統的朝蘇友誼加強和發展到新的更高階段的劃時代的契機」<sup>③7</sup>。金日成很快就得到了他想要的援助。1985年8月，一個龐大的蘇聯黨政代表團訪朝，同時有三艘蘇聯軍艦訪問元山港（這是蘇聯軍艦第一次訪問朝鮮港口）。是年，蘇聯還向朝鮮提供了薩姆-3型地對空導彈和二十六架最先進的米格-23戰鬥機<sup>③8</sup>。年底，

朝鮮總理姜成山訪蘇，莫斯科又同意援建原子能發電站<sup>⑳</sup>。由於經濟和安全上的依賴性，朝鮮不得不經常在政治和外交上對蘇聯做出妥協。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朝鮮的目的還是達到了。

武裝奪取政權本來就是中共的法寶和基本經驗，世界革命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內容，要想放棄，談何容易。1978年11月8日，鄧小平在與泰國總理江薩（Kriangsak Chomanan）談話時還說，「哪裏有共產黨不支持共產黨革命的」，如果放棄這個原則，就會失去在意識形態上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資格。為了不妨礙與東南亞各國政府建立關係，鄧小平還是堅持了毛澤東提出的把黨的關係和國家關係分開處理的權宜之計<sup>㉑</sup>。不過，幾天後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一番話卻令鄧小平感到意外：由於文革期間中國鼓動和支持東南亞國家的華人搞革命，東南亞各國更害怕的是中國而不是越南。鄧小平答應考慮這個問題。此後，中國就沒有再「輸出革命」<sup>㉒</sup>。1979年3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聯部〈建議為「三和一少」、「三降一滅」問題平反的請示〉並轉發全國，這個通報是在外事工作方面第一份撥亂反正的文件，為國家總體外交的調整打下了思想基礎<sup>㉓</sup>。此後中國領導人談到外交方針時便開始強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強調革命不能輸出，援助不能搞「恩賜」，支持各國人民革命只是道義上的責任<sup>㉔</sup>。

除了思想認識的轉變，當時整個國際共運形勢衰落也是導致中國不得不調整對外政策的原因之一。進入1980年代以後，阿拉伯共產主義活動陷入低潮，南亞各國共產黨大多轉入合法鬥爭，歐洲各國共產黨在選舉中的支持率降到最低水平，拉丁美洲共產主義政黨的力量總體來說也比較弱<sup>㉕</sup>。在東南亞地區，過去由中國支持和幫助建立的幾支共產黨武裝力量，如馬共、緬共、泰共、菲共、印尼共等，也日漸衰落。他們或者忙於內鬥，爭權奪利，或者武裝割據，安於現狀，很少再有甚麼革命行動。中共對東南亞各國共產黨的政策從1980年代開始轉變，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逐漸停止對這些黨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二是動員和幫助這些黨與當地政府進行和平談判，放棄武裝鬥爭<sup>㉖</sup>。此時中國關注的是發展經濟，需要的是周邊安定的環境，如何還會去支持鄰國的反政府武裝鬥爭？

朝鮮的想法和做法卻完全不同。1980年10月，金日成在朝鮮勞動黨六大號召：「我們要積極地開展對外活動，加強國際革命力量，……為我國革命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促使整個世界的革命取得勝利。」<sup>㉗</sup>大會認為，金日成提出的「關於加強同反帝自主力量的團結，擴大不結盟運動的方針，是指明當代世界革命的前程的戰略路線」<sup>㉘</sup>。金日成始終認為：朝鮮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是所有共產黨、工人黨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共同的國際事業；為世界革命的勝利而鬥爭，是各國工人階級和人民群众的國際主義義務<sup>㉙</sup>。1970年代中期以後，朝鮮在國際舞台上的確十分活躍，在第三世界和不結盟國家中的影響也日益增強，大有超越中國的勢頭，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以「革命」的名義取得了意識形態方面的話語權。此時，「朝鮮專家的足跡遍布整個黑色大陸」，朝鮮對第三世界特別是非洲的影響，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經不亞於中國了。截至1970年代末，朝鮮向非洲國家派出的軍事顧問共有

一千五百多人，此外還向二十一個非洲國家提供了近三億美元的經濟援助。有一個典型事例：津巴布韋取得獨立解放鬥爭勝利後，1980年10月，其領導人穆加貝（Robert G. Mugabe）首先訪問的國家是朝鮮。穆加貝特別感謝朝鮮的幫助，並說：「再沒有比金日成主席更好的朋友、兄弟和盟友了。」<sup>④</sup>而對中國，穆加貝只是在回國途中在北京做了「短暫停留」<sup>⑤</sup>。凡此種種，給人的感覺是，自毛澤東去世以後，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從北京轉移到了平壤。

### 三 意識形態分離：同盟的思想基礎發生動搖

在鄧小平時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不是語言表述的改變，而是核心內容的更新。在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社會的概念同蘇聯一樣，就是公有制和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內容就是階級鬥爭和繼續革命。儘管對於改革開放年代的意識形態問題進行理論梳理和抽象還有待時日，但是鄧小平的思路卻是簡單明瞭的，邏輯也是十分清晰的：中國是一個發展相對落後的國家，仍然處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因此不能實行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發展生產力」，而在落後的國家，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發展生產力，中心任務就是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為了實現這個根本任務，中國進行了政治和經濟兩個方面的改革。一、政治體制改革：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方針，突出民主法制的概念（公民權、改善黨的領導、基層自治、加快立法等）；二、經濟體制改革：打破計劃經濟的結構，引入市場經濟的概念（計劃為主、市場為輔——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sup>⑥</sup>。

中國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與蘇聯192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有許多相似之處，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就是，中國和俄國在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前的資本主義發展都很不充分，因此都不可避免地要「補課」——補上資本主義發展這一課。不過，這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是如列寧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即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政權的資本主義。在列寧看來，這就是社會主義<sup>⑦</sup>。概言之，就是1982年鄧小平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的那句話：「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sup>⑧</sup>

反觀此時期朝鮮的意識形態，金日成始終認為朝鮮奉行的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主體」思想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對中國的發展變化頗不以為然。當中國的改革剛剛起步時，金日成在1977年11月對外宣稱：朝鮮勞動黨提出的思想、技術、文化三大革命路線，「無論從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的本質要求來看，還是從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經驗來看，都是最正確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建設路線」<sup>⑨</sup>。不久，《勞動青年報》發表編輯部文章，批判「修正主義」者：不僅自己不革命，還不讓別人幹革命；不斷宣揚階級調和論，主張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各個方面進行合作<sup>⑩</sup>。這裏未使用「現代修正主

義」一詞——當時報刊上蘇共的代名詞，作者的用意顯而易見。1984年10月20日，中共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並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勞動新聞》在報導時，有意刪去了這個決定中「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和「是指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文件」兩句話<sup>⑤6</sup>。金日成在1986年底的施政演說中則強調，「要在經濟領導和企業管理中堅決維護和堅持我們黨建立的獨創性的主體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系」。朝鮮的報刊也宣傳：不管周圍發生甚麼形勢變化，颳起甚麼風，別人怎樣做，朝鮮將始終如一地按照自己的方針政策走下去<sup>⑤7</sup>。1987年5月金日成訪華時，鄧小平勸告他下次要去深圳看一看，並介紹了深圳、煙台和青島等沿海城市對外開放的經驗<sup>⑤8</sup>。一年後金日成卻對一些外國領導人說，朝鮮的經濟政策「一貫正確」，「不需要進行改革」，朝鮮勞動黨「要走真正朝鮮式的社會主義道路」<sup>⑤9</sup>。

如果說朝鮮在公開報刊上對中國的批評還比較隱晦，那麼在朝鮮勞動黨幹部的私下談話和內部文件中，這種批判就比較直接了。如一位曾經在華工作的朝鮮外交官指責鄧小平的改革政策是「迫於國際資本主義壓力的投降行為」<sup>⑥0</sup>。朝鮮一份形勢教育的材料上講，從開始改革開放算起，中國已經搞了十三年的資本主義。在朝鮮高層流傳着一個「三封鎖」的說法：對三八線進行軍事封鎖，對日本海進行經濟封鎖，對鴨綠江進行政治封鎖。為防止中國的政治影響，朝鮮嚴格限制中國出版物的發行，嚴密控制與中國人的接觸<sup>⑥1</sup>。正是出於這種擔心，1984年5月金日成以「教主」的口吻對東德領導人昂納克(Erich Honecker)說：我們最怕中國不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中國有十億人口，我們必須確保中國沿着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其他道路前行<sup>⑥2</sup>。

朝鮮確實認為自己已經佔領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高地」。1982年，金正日在紀念金日成七十壽辰的文章中指出：「主體思想開闢了按照自主的原則前進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的道路和國際關係發展的新時代。」<sup>⑥3</sup>到1992年4月金日成八十壽辰時，朝鮮勞動黨邀集世界各國的左翼政黨訪朝，並發表了一個宣言——〈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又稱「平壤宣言」），簽字的有七十多個黨的代表。該宣言稱：「每個黨無論在甚麼時候、任何環境下，都不應該拋棄革命原則，而應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前進。」<sup>⑥4</sup>金日成儼然已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組織者。中國雖然派遣國家主席楊尚昆前往祝壽，但是沒有參與該宣言的相關事務，既沒有簽字，也沒有在媒體上提及此事<sup>⑥5</sup>。顯然，在金日成看來，朝鮮已經取代中國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指導中心，正如1960年代毛澤東批判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的修正主義而取代蘇聯的地位一樣。（未完待續）

### 註釋

① 筆者查閱有關這方面研究的專著、論文，僅中文和英文的就有數十種、上百篇。如Kim Doug Joong,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North Korea: During Kim Il Sung's Last Days* (Seoul: Sejong Institute, 1994); Banning Garrett and Bonnie Glaser, "Looking across the Yalu: Chinese Assessments of North Korea", *Asian Survey* 35, no. 6 (1995): 528-45; Andrew Scobell, *China and North Korea: From Comrades-in-Arms to Allies at Arm's Length*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2004); Jaeho Hwang, "Measuring China's Influence over North Korea", *Issues & Studies* 42, no. 2 (2006): 205-32; Gordon G. Chang,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16, issue 1 (2012): 23-53; Ranjit K. Dhawan, "China and Its Peripheries: Contentious Relations with North Korea", 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IPCS), issue brief 231 (August 2013), [www.files.ethz.ch/isn/168038/IB231-Dhawan-ChinaPeriphery-NorthKorea.pdf](http://www.files.ethz.ch/isn/168038/IB231-Dhawan-ChinaPeriphery-NorthKorea.pdf)。
- ② 關於中蘇同盟破裂及社會主義陣營瓦解過程的描述，參見沈志華：《無奈的選擇：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1945-195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李丹慧：《無悔的分手：冷戰與中蘇同盟的命運(1960-1973)》，即將出版。
- ③ 詳見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1945-1976)》(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頁624-94。
- ④ 關於中國改革之路的深入研究，參見蕭冬連：《國步艱難：中國社會主義路徑的五次選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 ⑤ 延靜：〈周總理逝世金日成哭紅眼〉(2012年5月17日)，搜狐新聞，<http://news.sohu.com/20120517/n343463594.shtml>。
- ⑥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305。
- ⑦ 詳見沈志華：《最後的「天朝」》，第四章第二節，第五章第三、四節。
- ⑧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編：《中國改革開放大事記(1978-2008)》(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8)，頁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頁162。
- ⑨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簡史》，頁165。
- ⑩ 《中國改革開放大事記(1978-2008)》，頁39。
- ⑪ 〈最近朝黨對內對外宣傳的主要情況〉，《世界共運》，第13期(1979年9月5日)，頁2-6。
- ⑫ 美國國務院簡報，1982年4月，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數字化國家安全檔案)，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wo Koreas (1969-2000)，Item Number: KO00391。
- ⑬ 《人民日報》，1978年5月13日，第5版。
- ⑭ 盛平主編：《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卷(香港：泰德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頁181。
- ⑮ 聽到1959年廬山會議的消息後，金日成立即接見中國大使，要求到北京參加批判彭德懷。參見中央轉發喬曉光同志關於金日成同志的談話內容的報告，1959年9月25日，山西省檔案館，C54-1011-39，頁76。金日成於1960年5月秘密訪華，在毛澤東面前大罵彭德懷。參見毛澤東會見金日成談話記錄，1960年5月21日，未刊。
- ⑯ 1976年10月1日金日成給中國發來賀電，特別提到「深入開展批判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參見《人民日報》，1976年10月1日，第8版。
- ⑰ 鄧小平在1979年4月會見金日成時談到，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提出的意見「多數還是正確的」。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508。可以想見金日成聽到這番話的感受。
- ⑱ You Ji, "China and North Korea: A Fragil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Convenie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 no. 28 (2001): 389。1983年5月，《人民日報》刊登了金正日的一篇理論文章，參見《人民日報》，1983年5月21日，第6版；6月，中方又接受金正日作為朝鮮勞動黨主要負責人對中國進行內部訪問，參見《人民日報》，1983年7月8日，第1版。
- ⑲⑳㉑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辦公廳編：《中聯部老部領導談黨的對外工作》(2004)，未刊，頁102-103、155-56；49；51-53。
- ㉒ 江澤民與沈志華、李丹慧、楊奎松等人談話，北京，2009年9月24日。

- ⑲ 沈志華與王順生(2004至2006年任珠海市市長)的訪談，深圳，2015年12月22日；于洪君(中聯部原副部長)在一次學術會議的發言，上海，2017年8月30日。
- ⑳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頁1050-52、1176-77、1187。1984年9月，中國代表在聯合國第三十九屆大會上正式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前世界的兩大課題，也是中國內外政策的首要目標。《人民日報》，1984年9月27日，第5版。
- ㉑㉒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頁207、254、268、338-39；476。
- ㉓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國改革開放20年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頁159。
- ㉔ 《人民日報》，1989年2月26日，第1版。
- ㉕ 金日成在朝鮮勞動黨五屆十四次中央全會的講話，1977年9月5日。參見《金日成著作集》，第三十二卷(平壤：外國文出版社，1988)，頁326。
- ㉖㉗ 金日成在朝鮮勞動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所作的中央委員會總結報告，1980年10月10日。參見《金日成著作集》，第三十五卷(平壤：外國文出版社，1989)，頁320-21；323。
- ㉘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二局：《朝鮮勞動黨文件選集(1983年)》(1985)，未刊，頁233、237。
- ㉙ 《人民日報》，1979年4月4日，第1版。
- ㉚ 僅舉一例：蘇聯為朝鮮援建的雄基煉油廠年處理原油200萬噸，朝鮮早在1971年就提出希望能夠滿足其原油需求，但蘇聯以朝鮮沒有完成貿易合同為由，每年只提供70至90萬噸，而且在價格上不願讓步。參見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與朴成哲談話記錄，1971年10月8日，РГАНИ(俄羅斯國家當代史檔案館)，ф.80, оп.1, д.668, л.2-38；〈今年以來蘇朝關係更趨冷淡〉，《國際內參》，1977年7月11日，頁20-21。
- ㉛ 蘇聯為增加對朝鮮半島的發言權，爭取韓國的資金和技術，無視朝鮮的反對，不斷加快同韓國接近的步伐，就是一例。參見〈蘇聯東歐國家與南朝鮮關係新動向〉，《新情況》，第176期(1989年12月9日)。
- ㉜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二局：《朝鮮勞動黨文件選集(1984年)》(1986)，未刊，頁111-13。
- ㉝ 參見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二局：《金日成訪問蘇聯東歐文集》(1984)，未刊。
- ㉞ 《勞動新聞》，1984年7月10日，第1版。
- ㉟ *Правда* (《真理報》)，14 августа 1985г., 4；《勞動新聞》，1985年8月14日，第3版；金學俊著，張英譯：《朝鮮五十七年史》(2005)，未刊，頁529；Chin-Wee Chung, "North Korea'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North Korea: New Perspectives*, ed. Jae Kyu Park, Byung Chul Koh, and Tae-hwan Kwak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Seoul: Kyungnam University Press, 1987), 188-89。
- ㊱ 韓國外務部東北亞二科致駐香港總領事館，1986年2月12日，韓國外交史料館，9388/722.2，頁28-30。
- ㊲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頁422-23；《中聯部老部領導談黨的對外工作》，頁84。
- ㊳ 傅高義(Ezra F. Vogel)著，馮克利譯：《鄧小平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頁251-52。
- ㊴ 《中聯部老部領導談黨的對外工作》，頁34-35。「三和一少」指中聯部部長王稼祥等人1962年上半年提出的中國對外政策的建議，1963年被康生概括為「對帝修反要和，對世界革命援助要少」。文革開始後，康生又將「三和一少」上網為「三降一滅」，即對帝國主義降，對修正主義降，對反動派降，撲滅革命運動。
- ㊵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頁627-28、631-32；下冊，頁831；《胡耀邦思想年譜(1975-1989)》，上卷，頁612-13；譚宗級、葉心瑜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四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464。

- ④ 參見〈阿拉伯共產主義處於低潮〉，《中央聯絡部資料》，1982年5月13日；〈1984年南亞地區共運的一些情況〉，《中央聯絡部資料》，1985年2月12日；〈1985年各國共產黨情況〉，《中央聯絡部資料》，1986年7月19日；〈拉美共產黨的力量和影響的現狀〉，《中央聯絡部資料》，1986年9月9日。
- ⑤ 《中聯部老部領導談黨的對外工作》，頁11-12、36-37、82-86；〈1985年各國共產黨情況〉；沈志華、李丹慧採訪馬共中央北馬局書記阿成及指戰員記錄，泰國合艾、勿洞，2011年3月。
- ⑥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二局：《朝鮮勞動黨文件選集（1980年）》（1981），未刊，頁273。
- ⑦ 金日成在朝鮮職業總同盟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1981年11月30日。參見《金日成著作集》，第三十六卷（平壤：外國文出版社，1989），頁308；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二局：《朝鮮勞動黨文件選集（1986年）》（1987），未刊，頁80、158-65、271。
- ⑧ Балканский А., *Ким Ир Сен*,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1, с. 194-95.
- ⑨ 《人民日報》，1980年10月14日，第1版。
- ⑩ 參見章百家：〈關於改革開放研究的三點思考〉，《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5期，頁12-16；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中國改革開放20年史》，頁115-20、217-18、281-82、387；《中國改革開放大事記（1978-2008）》，頁73、111-12、124-31、143-46、156、169、291、296、302、31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頁843、1320-22。
- ⑪ 參見〈論糧食稅〉（1921年4月21日）、〈論合作社〉（1923年1月4日和6日），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510、767-74。
- ⑫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開幕詞〉（1982年9月1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3。
- ⑬ 金日成同旅日朝鮮新聞出版工作者代表團的談話，1977年11月20日。參見《金日成著作集》，第三十二卷，頁438。
- ⑭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二局：《朝鮮勞動黨文件選集（1979年）》（1982），未刊，頁211-16。
- ⑮ 《人民日報》，1984年10月21日，第1版；《勞動新聞》，1984年10月21日，第6版。
- ⑯ 〈朝黨堅持現行經濟體制，不談改革〉，《世界共運》，第59期（1987年5月18日），頁1-5。
- ⑰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頁1190-91。
- ⑱ 〈對朝鮮人事變動的一些看法〉，《政黨與世界》，第29期（1988年12月26日），頁1-3。
- ⑲ You Ji, "China and North Korea", 390.
- ⑳ 參見劉亞洲：《劉亞洲文集（二）》（北京，2004年6月），收入《中共重要歷史文獻資料彙編》，第二十七輯（洛杉磯：中文出版物服務中心，2009），頁298-99。
- ㉑ 昂納克（Erich Honecker）與金日成會談記錄，1984年5月30日，SAPMO-Barch（聯邦檔案館—民主德國政黨與群眾組織基金檔案），DY 30/2460。
- ㉒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二局：《朝鮮勞動黨文件選集（1982年）》（1984），未刊，頁109-10。
- ㉓ 《勞動新聞》，1992年4月22日，第1版。
- ㉔ 李鍾奭：《北韓—中國關係（1945-2000）》（首爾：圖書出版中心，2000），頁270。